

# 道家道教与中国古代政治



■道家道教政治伦理阐释

呂錫琛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JG12664



學海一牛鳴  
錢仲昭著

# 道家道教与中国古代政治

■道家道教政治伦理阐幽

呂錫琛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ZB501/4



90012664

PD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家、道教与中国古代政治 / 吕锡琛著. —2 版.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6

(学海一牛鸣)

ISBN 7-5438-0231-7

I . 道... II . 吕... III . ①道家 - 影响 - 政治 - 研究 - 中国  
- 古代 ②道教 - 影响 - 政治 - 研究 - 中国 - 古代 IV . ①D092.2  
②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2183 号

责任编辑:李建国

装帧设计:陈 新

**道家、道教与中国古代政治**

吕锡琛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2002 年 6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75

字数:404,000

ISBN7-5438-0231-7  
D ·51 定价:30.00 元



## 编者的话

《学海一牛鸣》是一套学术著作丛书，专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著述。

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空前活跃，并越来越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古为今用，更快更好地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这套丛书旨在为最新研究成果提供一个学术园地，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入与繁荣。我们将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本着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积数年的努力，出好这套丛书。

“一牛鸣”除字面一般意义以外，又为“一牛吼地”\*之简称，指牛鸣所及的距离。这套丛书兼取二者之义，凡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问世，即犹如牛之一鸣，其声宏亮，必然飞震林樾，闻于远处。学海茫茫，添一新作，又说明著述者已向前跨越一新的里程。

蒙著名学者钱仲联先生为丛书题签，谨此致谢。

湖南人民出版社

---

\* 一牛吼地，梵语长度单位“拘卢舍”的意译。《大唐西域记》卷第二《印度总述·数量》：“拘卢舍者，谓大牛鸣声所极闻。”

# 序

1985年11月，在我的故乡湖南湘潭召开了首次全国老子学术思想讨论会。这次会议在学术史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突出地提出并讨论了老子和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问题。针对海内外颇为流行的“儒家主干说”和80年代重新泛起的“复兴儒学”的主张，部分学者根据历史事实，在会上大讲“儒道互补”，并明确提出了“儒、道两家思想共同构成了多源汇流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之主干”的论点<sup>①</sup>。在会上、会下和会后，这一论点得到了众多中国文化研究学者的认同。近年来，关于中国传统学术主干问题的讨论又有了新的发展，以陈鼓应先生为代表的若干学者，进而提出“道家主干说”<sup>②</sup>，已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热烈讨论。在讨论中，这种观点亦被批评为“多少有些偏狭”<sup>③</sup>。“儒家主干说”、“道家主干说”和“儒道同为主干说”，到底哪一说更符合中国思想史的实际呢？这对于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

① 参见《求索》1986年第1期。

② 《哲学研究》1990年第1期。

③ 《哲学研究》1990年第4期。

性质和特点，明确批判继承的任务，改造“国民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很有必要就此展开深入讨论，以推动中国文化的研究。

在湘潭会上，我读到了不少好文章，包括湘籍青年女学者吕锡琛写的《老子思想与贞观之治》一文。该文以唐初贞观君臣之言行等大量思想素材，具体而清晰地说明了老子“清静无为”的思想，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对中国封建王朝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取得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国泰民安的积极社会效果。汉初有“文景之治”，唐初有“贞观之治”，宋初、明初君主自觉推行道家的治平之术也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类似的社会效果。那次会议上的许多论文，还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哲学思维方式、人生智慧等各个方面，具体论述了老子和道家思想对中国历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及其某些消极的影响，这种多面展开的具体、专门的研究，对于正确认识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很有益的。

我读了吕文之后，当时还谈过另一点感想，就是它启示我们：思想史研究应注意和社会政治史、经济史、科技史、文化史的研究相结合。列宁曾经说过：“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与运用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这才是需要的东西！”<sup>①</sup>这说明注意对思想的内在结构和逻辑演进，对概念、范畴之辩证发展和运用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sup>②</sup>思想、观念的源泉只能到客观物质世界和社会存在中去寻找。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一经产生，又会对社会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存在发生反作用，促进或者阻碍社会的发展。从思想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和反作用这两个角度，我们都应特别注意思想史和社会史之间的联系，通过社会政治史、经济史、科技史、文化史等等的研究，去说明一种思想、学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何以必然产生，它所反映的社会物质生活内容是什么，它在后世产生过何种影响和作用。这些都是就思想谈思想、对它进行纯逻辑的研究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思想史研究者应该扩大自己的视野，更多地学习和积累社会物质生活史和政治史等方面的知识，加强对这些方面的研究，这对更好地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科学地说明各种思想史现象是有重要意义的。

湘潭会后，吕锡琛同志循着思想史和社会历史研究相结合的路子，就道家、道教、神仙方术和中国封建王朝政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经过几载辛劳，终于写成一本近30万字的专著。这一课题前人还没有做过，研究起来有相当的难度，本书作者表现出了勇敢的探索精神，不仅敢探新路，而且多有不同于前贤的见解发表。本书所说的道家，沿袭传统习惯包括道教在内，而道教和从古代巫术演化而来的神仙方术又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本书作者指出，曾经被当做儒家学说之一部分的天人感应论、灾祥说和谶纬迷信，事实上与这派学说更加接近，谶纬乃是从方士的思想、信仰、方术过渡到道教经书的一个重要中间环节。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和神仙巫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着错综复杂的互相渗透和融合关系，作者认为董仲舒的新儒学实质上即是一种“以巫史、方士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思想为核心和骨架，以儒家君臣父子、仁政德化观念和黄老‘道法自然’、‘君道无为’宗旨为血肉”的“三合一”的思想体系。这些见解对于认识儒、道思想的历史地位和

作用无疑都是有重要意义的，至少是提出了很值得重视的一家之言。由于本书论述的对象包括道家、道教和神仙方士的活动，道家中既包括老子、庄子的学说，也包括黄老新道家的理论，因此在考察其对封建王朝政治的影响时，作者十分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全面论述其正、反两个方面的效应和作用，一切结论都以充足、翔实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力图防止主观性和片面性。作为一个青年学者，我认为其在学术研究起步时所表现出来的学风是良好的。

本书是中国道教文化研究的一项颇具特色的最新成果，它的出版是值得庆贺的。关于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它对中国历史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对中华民族心理和性格形成的深刻影响，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我期待着在这方面有更多优秀的专门研究论著问世。

方克立

1991年8月20日

# 前　言

在人类文化史上，有一部作品先后被四位最高统治者从政治治理的角度进行注释，这就是产生于我国先秦时期的道家学派代表作——《老子》。（除此之外，《老子》还是迄今世界上除《圣经》之外被翻译的语种和出版版本最多的作品。）自唐代以来，先后有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对其进行研究注疏，虽然他们对《老子》的理解深浅不同，践履和运用的程度有别，但是，在不同时期有如此多的最高统治者对同一部作品予以如此关注，这在古今中外可谓是绝无仅有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老子》政治伦理智慧与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汉唐盛世的出现密切相关。这一文化现象充分说明了《老子》学说在政治治理方面的重要地位，也反映出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与中国古代政治的密切联系。

《老子》受到如此重视绝不是偶然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中，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以其恢宏深邃、旷达宽容和充满思辨智慧的独特风采而著称于世。道教则是以道家思想为其

理论基础，博采古代原始宗教和神仙方术、儒墨阴阳诸家为一炉的中国本土宗教，它既包括神奇荒诞的鬼神信仰和神学方术，又包含了先人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类生命奥秘进行艰苦探索的结晶。道家、道教对中国的哲学、文学、书画、医学、化学、天文、地理、社会习俗乃至民族性格，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舞台上，更留下了它的巨大投影。

道家和道教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关于这一点，前辈学者王明、任继愈、王沐等先生早有论述。但是，由于《道德经》中包含了个人修炼以及某些神秘体验的内容，故在道教的创立过程中，被奉为基本经典。这样一来，原本不是宗教的道家，就被染上了宗教的神秘色彩，而作为思想家的老子，也就被奉为道教的始祖和尊神。大约从六朝时期起，道家和道教被统称为道家。宋元仍沿袭这一名称，而以“本”和“末”来区分二者<sup>①</sup>，这本身又反映出二者难解难分的历史状况。鲁迅先生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sup>②</sup> 鲁迅先生的这番论断，究竟是在肯定意义还是在否定意义上对道教做出的评价，学术界虽然有着不同的看法<sup>③</sup>，但我以为，此语至少道出了道教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道家、道教的这种重要作用，或者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掩盖、歪曲，或者被夸大和神化。因此，当人们注目于这些问题时，总是感到扑朔迷离、真伪难辨。神化道

① 宋代苏轼说：“黄帝、老子，道之本也；方士之言，末也。”（《文献通考·经籍考》五十二）元代柳贯说：“道家者流，以清静为宗，桧櫟纂醸其末也。”（《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十一七）

② 《致许寿裳》，《鲁迅书信集》上。

③ 蒋希泰：《重温鲁迅先生“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科学论断》；刘仲宇：《“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是肯定道教吗？》。载《弘道》第十一期，香港道教学院2001年版。

家、道教在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作用，无疑是荒谬的。特别是在科学发达的今天，这种观点显然已不攻自破。而忽略道家道教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在历史上的影响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因为这不仅影响我们客观、全面地考察思想文化与社会政治互联、互动的历史格局及其发展概貌，更阻碍我们继承和弘扬道家、道教在治国安民问题上的诸多宏论高见，阻碍我们发掘道家道教政治伦理思想这一弥足珍贵的思想文化资源。

政治伦理学是适应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多元化社会需要而兴起的学科。在中国古代，虽然未形成系统的政治伦理学理论体系，但儒道诸家却积累了异常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对于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特别是德治理论，先贤多有探究；而关于道家道教的政治伦理及其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则鲜有系统而全面的研究。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儒者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而道流人物则远离政治，他们的人生态度是出世的，他们只知独善其身，不关心国家的命运，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道家主张愚民政策、阴谋权术，宣扬无所作为、消极退让的懦夫懒汉哲学，对中国历史仅起着消极的影响；而道教则纯粹是统治者麻醉、愚弄人民的迷信，道士也多半是乘大、林灵素一类的骗子。这些看法虽不能说全无道理，但却是相当片面的。事实上，道家以其独特的方式深切地关注着政治，充满着忧国忧民的情怀。道家学派的代表作《老子》全文的 81 章中，就有 60 余章直接谈论治国安民用兵之道，包含了深刻的政治伦理主张。他们虽然重视个人修炼，但却认为养生与治国同理，修身之道可以推而广之，用于齐家、治国，圣人的个人修炼与帝王之功业是统一的，故《庄子》认为“帝王之事业，圣人之余事也”。

虽然在道家的庄子、列子一派人物中，有着疏离政治、意欲作逍遥游、御风行的出世退隐倾向，但他们也只是道家中的一派，道家学派中更主要的成分是以老子为代表的一派以及后来的黄老新道家。即使是庄子，也不是绝对的退隐，完全不问政治。只要我们读一读庄子及其后学撰著的《庄子》一书，就不难发现其中所蕴含的政治伦理智慧，确如陈鼓应先生在《老庄新论》中所言，庄子是“古代最具有自由性与民主性的哲学家”<sup>①</sup>。而且他们的隐居行为本身就是对于黑暗政治的抗议，其中不少人是社会批判意识的承担者<sup>②</sup>。当社会的政治气候出现由暗而明的历史转机时，道家道教中的退隐者往往也就因时而动，辅佐进步政治势力，复出从政，一展其济世安民之志。有的道士则强调，应当先“匡济帝王，解除祸患，使国宁民安，然后乃得隐靖修学”<sup>③</sup>。至于道家学派中以老子为代表的一派以及后来的黄老学派，则更是深切地关注政治，他们根据察古观今的历史经验和对于现实政治的深刻反思，提出了丰富的政治伦理智慧，为统治者构设出较为合理、公正的政治行政管理之术，体现出人类理性对于政治制度和政治行政治理方法之合理性、正当性的道德反思及批判。老子的一些思想虽然也曾被一些庸主昏君作为怠惰纵恣的借口，但从其主流来看，这套理论在古代政治治理中更多的时候是发挥治国安民的积极作用。关于这方面，明太祖朱元璋在《三教论》中的论述颇有说服力。他曾就世人“误陷老子已有年”的历史性误解进行澄清时说：“孰不知老子之道非金丹黄冠之术，乃有国有

① 陈鼓应：《老庄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② 见萧蓬父《道家·隐者·思想异端》，载《众妙之门》，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③ 《无上秘要》卷四二，《道藏要籍选刊》第十册，第143页。

家者，日用常行有不可阙者也。古今以老子为虚无，实为谬哉！其老子之道，密三皇五帝之仁，法天正己，动以时而举合宜，又非升霞禅定之机，实与仲尼之志齐。言简而意深，时人不识，故弗用。”<sup>①</sup>朱元璋极力否定老子思想与道教修炼的联系，虽然不免武断，但其力证老子思想决非“虚无”，在治理国家和修养道德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具有“密三皇五帝之仁，法天正己”的政治伦理意义，这些认识是颇为公允的。

道教学者则通过注疏《老》、《庄》等道家著作而继承发展了道家政治伦理，同时也整合了儒家的政治伦理；另一方面，道教又继承了原始宗教、神仙信仰和古代礼乐文化的神学思想和祈神仪式及各种方术，以神道设教的方式阐发着其政治伦理内蕴。前一方面反映了人类理性在政治行政领域的深刻思考和对于政治主体个人美德的要求，它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都是值得重视的。后一个方面则既是人类非理性的产物，又是人类意识到自己作为有限存在物并试图超越这种有限而努力提升自我或向异己力量寻求救助、追求无限绝对的一种方式。它们既可能对政治制度、政治行为、统治者个人品德等方面的缺陷发挥某种纠偏补弊或牵制约束的功能，又可能将这种缺陷恶性扩张从而导致弊上加弊。

因此，道教的方术、神学既可被封建统治者利用，成为他们愚弄和奴役人民的工具，又在某种程度上约束着统治者自身，使这些人间至尊的君主不至于毫无顾忌地滥施暴政。君主溺信方术，常常导致朝政腐败，权奸当道，身败国亡，而方术神学一旦为某些进步政治势力所利用，则又能在推翻腐朽王朝或战胜腐朽政治势力的斗争中发挥鼓舞人心、号召群众的作用。而在道教的

<sup>①</sup> 《明太祖集》卷十，黄山书社1991年版。

门下，既有隐遁修炼之士、装神弄鬼之徒和虚妄妖邪之术，也有经世济民之才、治国安邦之策和救死扶伤、健身强体之道。不少道教经籍在宣扬宗教神学的同时，也针砭了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提出了一些治世安民的主张，发挥着积极的社会作用。

道家道教的政治行政理论和政治伦理思想虽然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中结出的果实，但它已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走向了世界，在现代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勃发出它的生命力。例如，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就在国情咨文中引用了《老子》中“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名言，《老子》英译本一度成为美国的畅销书；美国、日本等一些国家的企业也将上面这句话和无为而治等思想作为重要的管理原则。美国的管理学家约翰·海德在《领导之道——新时代的领导战略》一书中，就引用了不少《老子》的话；艾博契特所著《二十二种新管理工具·序言》中，就引用《老子》“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他说：“讲这句话至今已有2000年的历史，它代表见识不凡的管理者的管理术，长久以来人们都在努力，但仍未有人趋近这种‘道’的境界。从某种意义来看，管理的历史，也就是试图实践这项基本观念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版的《未来的行政首脑》一书中，引述《老子》“功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一句，将其奉为成功的行政首脑的圭臬<sup>①</sup>。可见，《老子》思想对于现代政治行政管理和企业管理皆是富有启示意义的。

学术界曾有学者提出“文化力”的概念，认为每一种民族的文化体系，都有着自身独到的文化力，“文化力对社会生活乃至

<sup>①</sup> 见葛荣晋主编《道家思想与现代文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页。

对整个世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sup>①</sup>。这一看法是颇有见地的。我们认为，“文化力”的核心是“道德力”，它通过主体的道德实践活动而产生，进而作用于社会。在对道家道教政治伦理与中国政治的互动关系的考察过程中，笔者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伦理道德的力量，从而将思维焦点集中于探讨“道德力”对古代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作用问题。道德具有正面道德和负面道德，因此，这种道德力亦具有“正面道德力”和“负面道德力”，在《史鉴篇》中，我们将会看到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例证。当封建统治者践履道家道教的政治伦理道德精华时，呈现出的是一种正面道德力，其对中国古代政治行政活动产生着积极的影响，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发挥着正面的效应；而当统治者溺信道术迷信、背弃道家道教的政治伦理道德精华时，则形成一种负面的道德力，从而导致政治腐败，误国误身的危害。总结来自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不仅可以为今天的行政管理、企业管理提供宝贵的启示和借鉴，更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党中央“以德治国”方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更自觉地弘扬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智慧，破除封建迷信，高扬科学精神。

显然，这是一个重要而又颇具难度的课题。要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远不是几本小书可以说清楚的，以作者浅陋之学识及绵薄之力量，要完成好这一工作是颇不容易的。但是，道家道教政治伦理思想的深邃智慧及其对中国政治的重要影响以及人们对它的种种误解，又激起我探索、写作的热情和勇气，使我敢于在底气不足的情况下来啃咬这枚硬果。

本书首次出版是在 1991 年，虽然时隔整整 10 年，那种底气

<sup>①</sup> 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52 页

不足的感觉至今依然无法挥去。不过，经历了这段不算短暂的人生历程，我对这一课题的思考有了更多的心得。适逢此次增订再版的机会，对本书在内容上作了较大的增补和修改，吸收了本人近年来的一些科研心得，由原来从思想史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视角进一步拓展和深入，从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宗教与社会的互动，特别是从伦理道德与政治行为的互动这一角度，来审视道家道教政治伦理的理论价值、历史意义及现代启示。因此，本书增补了《理论篇》，着重从理论上剖析道家道教的政治伦理思想，阐释其精华，亦剔除其糟粕；原书的正文部分则依照新的研究视角进行了诸多修改，并命名为《史鉴篇》，着重考察历代统治者践履道家道教政治伦理主张的成功案例，亦反思暴君佞臣弃道悖德、纵欲殃民、溺于神仙方术而导致政乱国亡的历史教训。

我的探索是粗略和不成熟的。在此，恳切地期待着同仁的批评与指正。

# 目 录

序.....	方克立( 1 )
前言.....	( 1 )

## 理论篇

<b>第一章 道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发展概况及其理论基础.....</b>	( 3 )
一 道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发展概况.....	( 5 )
二 道家政治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	( 10 )
三 道家生德相养的道德内化机制.....	( 21 )
<b>第二章 对于仁义礼法的道德批判.....</b>	( 28 )
一 老庄对仁义礼法的道德批判.....	( 29 )
二 黄老道家对仁义礼法的道德批判.....	( 31 )
三 魏晋玄学家对仁义礼法的道德批判.....	( 34 )